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社会主义向度审视

李 帅,李 芳¹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高级形态,对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对照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马克思口中的“一般生产条件”。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文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层面考察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可能性,立足于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消费领域的普及运用,分析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引发的诸多社会议题,这种研究有助于理性地探讨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运用及在学理层面厘清人工智能的本质,有助于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一般生产条件;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4)01-0020-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4.0004

今天,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如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自动驾驶等领域广泛应用。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例,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两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分别是 ChatGPT 和 DALL-E-2,前者是能够分析问题并提供人性化回答的语言模型,后者则可依据用户输入的文字信息生成高质量图像。人工智能已经作为现实的生产工具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更好地讨论人工智能取得的巨大发展及其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需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钥匙”。思考人工智能能否成为马克思所言的“一般生产条件”,需深入地剖析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普及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议题,认识到人工智能是在一般生产条件资本化条件下,作为无偿、隐形的资本牟利工具,对人进行技术性取代这一实质。对此,我们认为,只有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同的财富”^[1],才能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发挥人工智能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舞。

一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现实基础

学界普遍将人工智能喻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新动力,这凸显了人工智能的巨大影响力。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人工智能极有可能成为某种“一般生产条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2]30},在 19 世纪,马克思把基础设施中的通信和运输手段视为一般生产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人工智能的作用与百年前的交通和通信设施完全可以媲美,如果人工智能可称为 21 世纪的新动力,那么它将会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构成一般生产条件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正确认识“一般生产条件”

何为一般生产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这一范畴,而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将单个资本与一般性条件之间的关系阐述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3]。

一般生产条件包括一系列组成部分。一般生产条件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铁路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设施,这些设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其

[收稿日期] 2023-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资助(编号:20&ZD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兴生命科技的人文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资助(编号:22VRC030)

[作者简介] 李帅(1991—),男,湖北荆州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¹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他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至关重要。道路、运河或铁路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单个企业,而是特定地区的所有企业。这些一般生产条件构成了特定历史时间每个企业必须适应的通用环境。在不同的情境下,对象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生产的一般性条件。例如,在物流和互联网行业中,物流集装箱和连接互联网所需的硬件设施是每个企业都必须承担的成本,是实际生产的必需品。只要运输是共享的,那么运输就可以被视为生产的一般性条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条件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般生产条件,是因为它们具有为所有企业服务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免费的或每个企业都能轻易获取的。

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及发挥其一般生产条件作用,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蕴含的辩证关系。一般生产条件总是限于特定的地域和时间段来划分。原始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不同于大工业时期,大工业时期不同于福特主义时期,福特时期又不同于后福特时期。每个具体的阶段,因其生产力不同,总会产生建基于上一个阶段并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生产关系。数据驱动时代的人工智能亦是如此。每个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对于下一个时期可能是“不充分的”或“无法承受的束缚”,其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一般生产条件必须加以调整或更新,使之成为适合新时期的条件。当这些条件适合时,“生产方式就获得了一种弹性,一种突飞猛进的扩展能力”^{[2]48}。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持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生产关系促进下的人工智能发展正呈现出基础设施转向趋势。

(二)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趋势

人工智能何以能够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实现由知识驱动向以数据驱动的飞跃。人工智能的“一般生产条件”转向,现阶段已经具有丰富的学理支撑。

其一,物质基础支撑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4]441}。因此只有当机器开始为机器生产零件时,机器本身才能成为生产的一般性条件,这意味着所有单个资本都能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机器。这里所有单个资本都获得足够的机器,并不是说单个资本都必须采用某项新技术,才能将其视为一般性条件的一部分,只要单个资本达到平均水平就可

以被称为一般性条件的一部分,同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万物互联”形成,传递出人工智有望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物质基础。

其二,现实成就表明了人工智能向一般生产条件发展的可能性。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智能助手(如 Siri 和小艺)可以回答问题、执行任务和帮助人们更高效地管理日常事务。医疗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医生进行诊断。人工智能系统可被设计成自主运行的系统,人工智能也被用于娱乐和创意领域。例如,艺术生成算法可以创建音乐、绘画和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编写新闻文章。此外,物联网、智慧城市和环境智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可能性。总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诸多领域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人工智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困境。

技术奇点和数据“暴食”可能会对人工智能和数据革命带来重大变革和挑战。技术奇点临近时市场体系将拥有自己的生命,人工智能是“异己的力量”,是自主资本的力量^{[2]19}。马克思指出,“最终……一种非人的权力统治一切”^{[2]2}。两百年前的马克思写的并不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而是工人的异化,工人被资本剥夺了对自己制造方式、社会关系及生产出物品的控制权,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工人异化的顶点。“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工厂和农场的职位数已经从 60% 降低到如今的 6%。在未来的 20 年几乎所有的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将会被自动化”^[5]。随着机械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的自动化。人工智能接近或达到奇点的地平线,所开辟的前景就不直接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而是机器资本作为独立于人类自动主体的提升。“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家赋税创造出来……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6]这表明技术高度发达时资本将具有高度的自我独立性。正如“加速主义之父”尼克·兰德(Nick Land)指出,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不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而是抛弃生产资本的工具——人类。

一般生产条件一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革,一般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关系通常处于平衡/倾斜/平衡的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不会一直持续,在某个时刻将会到达瓶颈期。人工智能如果要真正成为一般生产条件,那么数据“暴食”将会是人工智能必须克服的瓶颈,人工智能必须“学会”自行处理数

据,依赖于人类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始终没有达到“智能”这一标准。数据“暴食”指的是在数字时代,数据的生成和收集速度迅猛增长,以至于人类很难有效地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数据“暴食”是由互联网、传感器技术、社交媒体等信息产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引起的。人工智能数据“暴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数据食物”要从哪里获取?技术的发展为人工智能的“食物”来源提供基础平台,如市面上的各类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网络、视频或音乐流媒体服务的用户,还有计算机软件或零售消费者,这些平台以数字化方式收集客户产生的海量数据,获取的这些数据使平台公司成为训练机器学习系统的有利场所。第二个问题是“数据食物”进入系统胃部以后,要如何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此时,数据标注师就发挥作用了,数据在输入系统以后,系统内部的数据是杂乱无章的,数据标注师将“教会”系统理解和判断事物。此前 Open AI 使用非洲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数据标注,目前谷歌、Anthropic 在内的人工智能巨头都在进行数据标注自动化的探索。最引人注目的是初创公司 refuel 上线了一个 AI 标注数据的开源处理工具: Autolabel。这个开源工具能用 GPT4.0 代替人类标注数据,且效率比人类高出 100 倍,成本却只需人工的 1/7。但自动标注技术的识别度远不如人工,且应用范围较小。因此,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是在对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之上的。要实现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的友好转变,就必须克服数据“暴食”这一缺陷。

尽管人工智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困境,但人工智能已经在生产、消费等领域逐渐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了,这表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 21 世纪的“一般生产条件”。从 ChatGPT 到 ChatGPT4.0 的快速迭代,展现了人工智能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也愈发凸显。

二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症候

人工智能具备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现实要素,一般认为技术本身无意识形态指涉,但技术在不同的制度下运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高级形态具有区别于以往生产工具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描述了制造业时期一般生产条件是如何转变为适合大工业生产的生产条件。自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包

括泰勒主义、福特主义以及后福特主义,该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描述性术语:数字资本主义、物流或供应链资本主义以及认知资本主义等。在后福特主义之外,资本主义或许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实存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Actually Existing AI Capitalism)^{[2]50}。“实存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相较于前几个时期,有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人工智能产业结构性特征带来了技术垄断。垄断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人工智能的诞生源自国家的支持,国家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原因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垄断。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垄断正是资本不断扩大的驱动器,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4]699} 国家在发展中有一个突出的作用,即生产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等基础设施。但是,当一般生产条件变得有利可图时,它将会归私人所有。如实行“赶超式”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支柱性领域进行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并且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方向,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7]。

其二,人工智能开放源码组件的结果是带来资本积累。人工智能开放源码组件的出现,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的科技巨头垄断,然而讽刺的是,这种开放源码组件的出现,发起人是科技巨头,最终的受益人同样是科技巨头。因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8]。人工智能技术在普及之后,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寡头的控制之下。类似于在谷歌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将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泄露到网络市场,无偿供学习者使用,假如学习者在掌握相应的技术后,顺利通过了谷歌公司的专业技能面试,进入到谷歌公司工作,依次循环。谷歌公司可以在保证最低入职培训的基础上得到一个能为其生产最多剩余价值的技术人员。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不一定是红利,正如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中所言:构筑于科学和理性之上的启蒙文明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9]。人在制

造机器或其他工具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思想隐蔽性地与自己分离开,这样一来,在机器中,客体转化为主体,而主体又被客体化^[10]。透过人工智能产业的特征可以发现资本调控下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性失业危机的本质,即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革新趋向将会减少对劳动的酬付与使用^[11],直至“完全取消人的劳动”^[12]。

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失业危机正是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中的典例。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对工作岗位“剥夺”的趋势。“死劳动”与“活劳动”的争议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死劳动”与“活劳动”涉及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方式的问题。“活劳动”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对脑力和体力的运用,这种劳动创造价值。“死劳动”指以往劳动的凝结,可以理解为资本等投入,它和活劳动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死劳动”作为物化劳动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物化劳动指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在商品经济中通常指商品的价值^[13]。这种劳动创造了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工厂等,但它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简言之,活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而“死劳动”不能,仅转移价值。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甚至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超越。

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逐渐脱离人类主体的掌控,反而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技术发展是导致人类被驱逐出生产过程的原因,人类的工作让自己成为多余的人且逐渐丧失主体性。作为“死劳动”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岗位的取代趋势越来越明显。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引起的技术性失业存在两种较为突出的主流争论:一方面是未来学家对“人工智能启示录”的预测,认为就业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继续“一切照旧”,只受到轻微震荡的干扰。

“一切照旧”派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帮助人类实现自由解放。无疑,对比几世纪前的“手推磨式”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生产方式具有绝对性优势。全球人口出生率的断崖式下降这一突出问题更加巩固了乐观主义的这一观点。参考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人口出生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2022年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

6.77%,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出现负增长(2022年为-0.60‰)^[14]。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情况,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重,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空缺岗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会是社会运转系统中一个必需的补充成分,此时人工智能的一般生产条件转变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在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转化过程中存在着加剧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及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应用开发与终端消费结合越来越紧密。在单个公司层面,人工智能资本可能倾向于赢家通吃的所有权集中和垄断。

“人工智能启示录”派则抱怨那些将知识“注入”机器的研发人员,仇视抢走工人工作的机器,堪称现代版的“卢德主义”(Luddism)。人工智能剥夺了一些工人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那些从事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94—2019年,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都在不断下降,但是就业创造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就业破坏率”^[15]。人工智能表面具有破坏就业的力量,对于这一思考应明确当前的人工智能“热”不仅仅是技术突破所引起的,更是资本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窘境而加速的。与其将人工智能看作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取代,不如将这一过程视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弥补,可能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资本调控下的“机器换人”问题具有阶级性。大卫·H. 奥特尔(David H. Autor)将科技创新与工作变化的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科技创新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的观点^[16]。在科技知识普及提升后,资本家将会增加对顶尖技术人才数量需求,减少对常规脑力劳动工种的需要,同时向低收入型工作配置大量劳动力。拥有算法的人成为顶级富豪,而被数据控制的那部分人则成为贫民窟的“候选者”。“社会工厂”中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大大延展了人的劳动空间,但反而形成人类共同富裕无形的桎梏。“社会工厂”生产领域的巨头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和数据来组织和控制劳动力,依据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灵活地雇佣和“抛弃”工人,因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7]。

在人工智能的催化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会导致新的社会阶层和劳动力组织模式的出现。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有必要采取相

应措施加以引导,对此提出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导向,其优先考虑的既不是终止技术发展,也不是逃避现实问题,而是清算迄今推动人工智能恶性发展的资本。

三 症结之解: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

人类对机器挑战人类、威胁人类甚至取代人类的担忧由来已久。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就特别强调技术发展将会导致系列问题,如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比起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来讲,更可怕的一点在于:在机器进步的同时人类却停滞不前甚至是退步,但这正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后果。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机器首先是社会性的,然后才是技术性的”^[18]。人类并不能拒绝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因为马克思在晚年也没有放弃机器,对于技术的两面性,人类主体可从自身需要出发,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主体的为我性,让技术造福于社会 and 人类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9],故而人机关系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更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实践。

(一)打破以“稀缺性”为旗号的数字技术壁垒

打破数字壁垒是克服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氧气、阳光等资源原本是公共的、免费的,不属于资本的范畴。然而,给水“定价”的行为,便将水划入了资本逻辑思维中。资本正是创造了资源的这种“稀缺性”而实现了资源的资本转变。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打着“稀缺性”资源旗号。马克思指出,通过瓦解共有物来人为地制造“稀缺性”是原始积累的本质。人工智能技术的民主化就是“圈地运动”的逆向运动,就是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稀缺性”,将建立一个对抗资本主义技术稀缺性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针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技术稀缺性或技术壁垒必须实行全面的反垄断改革。资本家凭借马六甲海峡地理优势使其成为了可定价资源,成为了资本的筹码。当技术掌握在少数高新企业时,技术就成为了新的、无形的“马六甲海峡”。同样的垄断也出现在 21 世纪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对此,传统的反垄断法在数字时代需以一种现代化的方法进行重构,即实施前瞻性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巨头损害初创企业,垄断行业,阻碍社会进步。

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集社会化,具体来看,一是推进数据民主化,制定政策来保护个人隐私,控制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并确保数据的公平共享。二是建设共有化的人工智能资源,将人工智能技术和资源社会化,以避免私有垄断,确保公共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三是制定前瞻性政策以保护工人免受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培训和重新就业计划。综合来看,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主义发展赋能,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选择。

面对资本逻辑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只有变革“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控制一般生产条件资本化的劳动异化,才能促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主义“共同财富”。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社会,自然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劳动力都集中体现在机器之中,要摆脱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逻辑烙印,就必须打破技术壁垒,推行人工智能技术民主化。人工智能领域打破数字壁垒指消除或缩小人工智能技术和知识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让技术流通于社会各阶层,以确保社会各阶层能够获得、参与和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包括但不限于让更多的人拥有人工智能技能和知识,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准入门槛,以及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各个社会群体。此外,还需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合理限制,采取全面、分布式的监管方法以保护公民权利。

(二)通向社会主义导向的“共有财富”未来

要消除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需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马克思指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20]资本通过竞争引发创新、提高生产力恰好为未来社会人们富裕且自由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但资本掌控下的技术只是为资本家牟利的生产工具,不是通往“自由王国”的现实路径。只有社会主义导向下的“共有财富”模式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困境。因为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坚持以人民为本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以普惠人民为旨归,不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是压榨劳动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将是解放劳动的手段,是发展人的一般生

产力与扩大并完善人的社会生活的手段^[21]。

社会主义导向的“共有财富”路径能够有效解决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困境。该路径的实现,关键在于人们要对生产资料进行自主、横向的共同管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了“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22]当然,“共有财富”不限于自然资源,还包括各种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财富再分配为目标,这种不涉及生产关系本身的改革仍属于资本范畴。恩格斯就此明确指出:“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23]

四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在审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时,首要任务是分析人工智能如何塑造和影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将会出现发展瓶颈,原有的社会关系将无法适应现有的生产力发展,如果不采取改革措施,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高低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生产工具设备的改进、自动化技术的革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包括诸多类型,这里重点强调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作为智能时代新型的生产工具,延展了人的有形机体器官,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加速了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民主化,马克思主义倡导公有制和社会化的生产手段,夺取资产阶级对于生产和分配的掌控权^[24]。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新兴技术的社会后果,明确“卢德主义”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对于“人工智能将会带给人类何种未来”最为理智的看法是:这不取决于技术本身,决定权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或许某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可以超越人类,但也许就在这个时间区间,人类必定已经寻找到了与其和谐共处的方式^[25]。人工智能技术“共有财富”路径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本身,由社会共同管理生产资料,即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进行民主决策。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技术的创新一直以来依赖于技术鸿沟,没有技术的差异,就没有竞争市场份额的动机,技术的创新速度将会大大放缓。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封闭性技术”才是人工

智能、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发展的最大阻碍。

[参考文献]

- [1] 潘依林.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2): 39-46.
- [2] DYER WITHEFORD N, KJØSEN M A. Steinhoff J. In-human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201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库兹威尔. 奇点临近[M]. 李庆诚, 董振华, 田 源,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206.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5.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 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 44(11): 31-37.
- [8] 吕梁山. 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及其基础: 多种剥削论评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3): 112-116.
- [9] 张星萍.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特征[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6-27(3).
- [10] 易显飞. 努力开拓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边疆[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7(4): 42-48.
- [11] 薛丹妮.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资本逻辑及内在张力[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9(5): 130-137.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74.
- [13] 许明远. 非劳动生产要素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J]. 江西社会科学, 2001(12): 71-73.
- [14] 阮成武.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与应对: 《困境与出路: 基于人口出生率波动的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J]. 财经论丛, 2023(7): 113.
- [15] 唐 永, 张 街. 人工智能会加剧资本主义失业风险吗: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 财经科学, 2020(6): 60.
- [16] 谭宏泽, 杜胜臣. 不平等、阶级与全球化: 反思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不平等研究[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86-96.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86.
- [18] 理查德·西摩. 推特机器: 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 [M]. 王伯笛,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6.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34.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 [21] 李石.从共享的数字劳动到数字福利的共享[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3):127-133.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
-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5.
- [24] 宫维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9):25-30.
- [25] 王广赞,易显飞.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流派:比较与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4):1-6.

A Socialist Perspectiv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LI Shuai, LI F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advanced form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mbitious goals of a communist society. In contrast to the “infrastructure” i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AI may become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in Marx’s words.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Marxism,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AI becoming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from the level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many soc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in the fields of production, life, and consumption, which is helpful for rationall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I as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This kind of research helps to rationally explore the rational use of AI as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nature of AI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help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AI development oriented to socialism.

Key words: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AI capitalis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m

(本文编辑:王萍)